

走向“天人合一”：费孝通的环境社会学思想及其生成探究

郑进*

摘要：到目前为止，费孝通作为一个学术符号已经与“乡土中国”“差序格局”“文化自觉”等标签融为一体。鲜有研究讨论费孝通先生的环境社会学思想，更没有学者将他作为一个环境社会学家来看待。本文根据费孝通在不同时期关于“环境”的书写和思考，认为其环境社会学思想主要呈现四方面的内容：早期受功能主义影响，将环境作为有用的人文地理环境看待；在志在富民的使命感召下，探究环境作为发展的条件这一面向；乡村工业发展中作为问题的环境；文化视野中作为“天人合一”的环境。本文还尝试结合其个人生命史，从作为社会学家、“最后的绅士”和儒家三重身份分析其环境思想生成的可能缘由。尽管费孝通不是一名严格意义上的环境社会学家，但从强调环境主体性的角度思考其环境思想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费孝通 环境社会学 天人合一

* 郑进，江汉大学法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环境社会学、移民社会学。

一 导言

作为 20 世纪中国最为杰出和博学的社会学家之一，费孝通一生留下 960 多万字的笔墨，有诗歌、散文、杂记、游记、报告、论文等多种文体，涉及社会学的多个领域。然而，也有学者认为费孝通一直在有意或无意忽略环境这一维度和环境问题，甚至在晚年力推小城镇的时候对已经出现的环境污染“视而不见”。^①

费孝通作为一个学术符号已经与“乡土中国”“差序格局”“文化自觉”等标签融为一体，却鲜有研究讨论费孝通先生的环境社会学思想或将他作为一个环境社会学家看待。

其实，纵观费孝通的研究，尽管其对“社会”“生态”进行结构分析的色彩极为明显，但“社会”并非孤立存在，其所剖析的“社会”“生态”与“自然”“环境”紧密相联。特别是到了晚年，费孝通直言“人根据自身的需要造出来的一个第二环境”，社会和自然不是两个“二分”（duality）的概念，更不是相互“对立”的，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不同层次，要把“人”放到自然历史演化的总的背景下去理解。^②尚敬涛通过梳理学界对费孝通的再研究，发现无论是费孝通还是其研究者，都鲜少触及环境社会学这一议题，^③并且费孝通先生本人对环境的直接论述也确实着墨有限。不过很显然的是，费孝通本人并不是到了暮年才开始思考人与环境之间关系这一论题，其环境社会学思想/环境观一直贯穿于其社会学分析框架和理论视野之中。

费孝通尽管没直接提出自己的环境社会学思想，不过终其一生他

① 张玉林：《是什么遮蔽了费孝通的眼睛？——农村环境问题为何被中国学界忽视》，《绿叶》2010年第5期。

② 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群言》2003年第12期。

③ 包括费孝通的弟子在内的研究者对于费孝通先生的再研究都极少谈及其环境、生态类主题的研究，即使沈关宝对江村的再研究中论及环境的部分也不到400字。参见尚敬涛《费孝通生态环境思想与江村水域保护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8年。

都围绕着环境社会学的核心议题——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环境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及互动^①做研究,可以说对环境/自然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的思考是其一生的命题。从费孝通一生留下的文字来看,他的环境社会学思想大致可以梳理出以下四个主要方面:①功能主义影响下,将环境作为有用的人文地理环境;②志在富民,将环境作为发展的条件;③乡村工业发展中作为问题的环境;④文化视野中作为“天人合一”的环境。

二 有用的人文地理:功能主义视角下的环境认知

费孝通在清华大学和英国求学期间深受当时正流行的功能主义思想影响,此时费孝通十分倾向于近代思想家严复对“群学”的理解,将社会看作由人群组成的,他曾谦虚地表示其原因也许是在当时并没有意识到除了第一种看法之外,还有第二种看法,以及两种不同看法的区别。^②此时费孝通十分注重社会的功能和有用性,认为文化等人类创造的外在于社会的事物都是用来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的。也就是说,费孝通此时认为包括环境在内的一切是服务于社会的特定需要。

费孝通最早对“环境”因素的重视,从其将 community 翻译为“社区”这一中文概念时就已经初露端倪。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派克(Robert Ezra Park)教授来清华大学讲学,清华师生组织对派克的成果进行翻译,其中有一句是“Community is not society”,费孝通和他的同学们无法接受原有的“地方社会”的翻译,也无法将该句翻译为“社会不是社会”。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费孝通提出将

① 大卫·佩罗、霍莉·布雷姆:《理论与范式:面向 21 世纪的环境社会学》,《国外社会科学》2017 年第 6 期。

② 费孝通:《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 年第 1 期。

“community”翻译为“社区”，并得到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师生的认可。^① 费孝通强调 community 的具体时空特性，特别是有一定具体空间边界的生活环境。作为费孝通的重要学术领路人的吴文藻先生也极为认可费孝通的这一翻译，曾明确提出社区包括“人民所居处的地域”^②。由此可见，费孝通在步入社会学之初即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人们生活的环境对于社会共同体形成的积极作用。

以费孝通的名作《江村经济》为例，可以看到此时“环境”是作为一种对共同体的维系有着积极作用的人文地理环境而存在的。在进入人类学视角下对“中国农民的经济生活”进行描述之前，人文地理环境的介绍占据了重要位置。费孝通在开篇就指出“它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③。在此时的分析框架中，地理环境作为“有用”的因素而存在，故而在随后特地用了一章的篇幅来介绍调查区域，将作为自然的环境进行了横截面的介绍，包括区位环境、地理环境、生态环境，特别是这种环境下所形成的买卖制度。费孝通判断隐性的买卖制度和这一地方的区位组织一定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村里面仅存的两家杂货铺完全不足以供应村民们生活所需，费孝通认为客观地理环境中一定存在着一种体系来支持江村村民的经济生活需求。^④

在随后的云南三村研究中，人文地理环境的差异或者说因地理环境所导致的发展阶段性差异被魁阁研究者们作为选择田野点的重要依据，甚至易村是根据他们对农业发展和村庄与外面的关系而特地选择的一个十分偏僻的农村，费孝通和张之毅从昆明到易村就花费了6天时间。

① 丁元竹：《中文“社区”的由来与发展及其启示——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110周年》，《民族研究》2020年第4期，第22~24页。

② 吴文藻：《花篮瑶社会组织》，载《费孝通全集》（第4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序言”。

③ 参见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页。

④ 参见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页。

尽管如今学界一般倾向于采取分期或者转型的视角看待费孝通,将早期的费孝通看作农村研究学者,不过将环境作为有用的人文地理环境的视角同样呈现在其早期对城市的分析之中。如同对江村的研究一样,费孝通同样认为都市社区研究的第一步就是发现它的自然区域。费孝通认为都市社区研究也需要将都市划分为若干自然区域,在此基础上思考各区域的生活形式、特点及不同区域的区别。^①

此时费孝通对于文化的理解同样立足于具体的地理环境,他认为文化是土地里面长出来的,进而提出“文化本来就是人群的生活方式,在什么环境里得到的生活,就会形成什么方式,决定了人群文化的性质”^②。从中不难看出费孝通强调一定人群所享有的文化受这个地方特定的环境塑造,无怪乎他会使用具有地理环境意味的“土”字来总结中国农村的特点,因为土地对中国农民产生了极为深厚的影响。^③

概言之,此时期费孝通深受功能主义的影响,认为环境是有用的人文地理环境,用来满足一定范围内人们的各种需求。不无遗憾的是,在云南三村研究之后费孝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能够继续自由地对一个完整的社区做人类学研究,也没有书写民族志,在短暂地为国之前途奔走呼喊之后他被迫远离学术研究长达近 30 年,等他再次回归学术时,其关于环境的理解也发生了重要改变。

三 作为发展条件的环境

费孝通先生于 1978 年正式恢复工作,曾经年轻的他已是“春来秋去二十年,白了少年头”。自感学术生命有限的费孝通迅速投入社会学重建的艰巨工作之中。在《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

①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29页。

② 费孝通:《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载《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年。

③ 参见费孝通《乡土本色》,载《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9页。

我思考》一文中，费孝通回忆道：“我初学社会学时，并没有从理论入手去钻研社会究竟是什么的根本问题。我早年自己提出的学习要求是了解中国人是怎样生活的，了解的目的是在改善中国人的生活。”^①这一思想在费孝通的学术第二春时期表现得非常明显，甚至在他自己看来有时不我待之感。

特别是近半个世纪后，费孝通发现中国依然有很多农民的生活十分艰难、缺衣少粮，温饱问题没有解决。发觉自己离政治近了点、离学术远了点的他更加注重寻找改善中国农民生活的途径，他的使命是“志在富民”。《志在富民·代序》所言即是“我们要用知识推动社会前进。出主意、想办法、办实事、做好事”^②。此后的一段时间内，费孝通先生对于“环境”的认知发生了非常重要的转变，从前一时期将“环境”当作“有用”的人文地理环境转变为将之当作社会经济条件的条件，即一定环境中的人如何与环境互动，如何让环境服务于社会发展。成于20世纪80年代的《赤峰篇》《武陵行》《临夏行》《重访民权》《凉山行》《定西篇》均是极好的证明。

以费孝通先生在1984年写作的《赤峰篇》为例，该报告的第一、二部分如对江村的描述一样，详细地记录了赤峰的地理环境、生态环境等，这继承了其前期功能主义的写作手法。在随后的第三部分费孝通先生写了赤峰在防治风沙方面的努力，随后重点提出了赤峰发挥自然环境的优势推进农牧结合发展地方经济的出路。在这里，区位环境、自然环境状况、交通状况等成了费孝通对环境进行思考的重要维度。^③

在《武陵行》中费孝通更是直接使用“地貌和民族”作为第一节标题，详细分析了“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环境下的丰富资源，在分

① 费孝通：《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

② 参见费孝通《志在富民——中国乡村考察报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页。

③ 参见费孝通《赤峰篇》，载《志在富民——中国乡村考察报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5~159页。

析丘陵地区山地资源丰富的基础上提出发展庭院经济,让当地人能够从周边的生活环境中获得奔向小康的机会,也就是该报告中的“开始脱贫致富的最简单公式即劳动力与当地丰富资源相结合”^①,直接点明了人依靠环境资源发展的思路。费孝通在《临夏行》中提出“处在农、牧中间地带的陇西走廊,应当自觉地抓住经济地理授予它的特殊地位,来发展自己的优势”^②。

从这里不难看出,除了民族环境这一维度只在民族地区强调外,在费孝通心目中“环境”一般包含着地理、资源等维度。整体而言,费孝通这一时期思考的是如何发挥人的能动性,立足当地,找到当地所蕴藏的资源条件,并将这些条件转换成为市场经济中的资源,从而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在“志在富民”的使命感的感召下,“想好好利用兜里所剩无几的‘生命资本’”^③的费孝通在分析“环境”的区域背景维度的基础上,特别突出分析“环境”作为潜在资源和发展条件的一面。在《行行重行行》中,费孝通在各地不断寻找贫穷落后的原因、制约发展的关键因素,在环境中寻找潜在的资源优势。费孝通也特别高兴地看到各地经济社会状况都在不断改善。

四 作为问题的对象的环境

不得不说,如今环境污染问题或者环境问题的社会学分析是环境社会学的主流。尽管诸多费孝通思想研究者没有重视费孝通的环境思想,甚至张玉林认为坐在会议室里听取汇报和座谈,乘着轿车“走马

① 参见费孝通《武陵行》,载《志在富民——中国乡村考察报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79~394页。

② 参见费孝通《临夏行》,载《志在富民——中国乡村考察报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32页。

③ 参见《费孝通全集》(第17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2页。

观花”，这种在费孝通的晚期社会调查中占主流的调查方式，以及对农村工业化的乐观期待遮蔽了费孝通的眼睛，使得他对包括江村在内的已经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视而不见”并缺少了应有的问题意识。

然而，仔细梳理会发现，其实费孝通在江村调研之初就已然看到人们随意将生活用水、大小便直接排入门前的河道之中，导致夏天降雨量较少时臭气熏人，也直接影响了人们的饮水。^① 不过此时费孝通先生更多是从中国文化“公”和“私”的角度来解释这些社会现象，当时这一季节性的污染问题到底多严重现在已然无法确证。

到了20世纪80年代，尽管费孝通极力推动社会学经世致用的一面，希望通过农村工业化和小城镇建设来达至民富，但老人家的眼睛并没有被遮蔽，也没有忽略环境问题，他同样在将环境作为问题的对象。

早在1984年，费孝通在《及早重视小城镇的环境污染问题》一文中首次直接提及环境污染，他发现至少在经济比较发达、小城镇工业有了一定发展的地区，污染已经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已经到了必须加以重视的程度。他意识到环境问题的不公正后果也已经出现，他写道：“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大中城市随着工业的扩散而扩散污染。大中城市污染小城镇，小城镇污染农村，这是小城镇和部分农村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② 因此，不能说此时费孝通没有关注到“环境”的污染这一层面。

1985年前后在赤峰、定西调研时，费孝通也提到了这些地方由于人口的快速增加，出现了树木日稀、水土流失、沙化明显、草场退化等环境问题，甚至因为这些自然环境问题引发了农牧矛盾和一些冲突。费孝通认为人地矛盾是环境问题激化的重要因素。^③

1992年，费孝通在《对民族地区发展的思考》一文中首先提出了

① 费孝通：《差序格局》，载《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25页。

② 费孝通：《及早重视小城镇的环境污染问题》，《水土保持通报》1984年第2期，第31~33页。

③ 具体参见《志在富民——中国乡村考察报告》中的《定西篇》《赤峰篇》等内容。

“边区的两个失调”中的“自然生态失调”。^①甚至一直到他最后一次访问定西的 2003 年,费孝通还写到定西在治理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工作上取得的一些成绩,指出把生态环境改造好,就像万里长征刚刚走了第一步,并与时任青海省副省长的洛桑灵智多杰讨论了甘南的生态问题。^②

当然,费孝通晚年在《小城镇研究十年反思》一文中谦虚地反思了自己之前的“疏忽与过失”。他自我批评道只看到了小城镇的正功能,比如增加居民收入、起着人口蓄水池作用等,而没有从根本上抓住它的要害,费孝通讲道:“这 10 多年只吃了小城镇这颗核桃的肉,而丢了核桃的壳,软件固然味道好,硬件也应注意,不然小城镇会熙熙攘攘乱成一团,好好的江南水乡乱糟糟、不成格局,更严重的是污染青山绿水。”^③这或许是包括张玉林在内的学者认为费孝通的眼睛被遮蔽的“自我明证”。

由此可见,费先生在最后 20 余年的“行行重行行”之中,一方面努力从当地环境中寻找富民的办法、模式,另一方面也在揭示已然出现的环境问题。集学者与官员身份于一身的费孝通并没有完全忽略作为问题的环境。至于费孝通“眼睛被遮蔽”的缘由,从其近 50 万字的《行行重行行》中可以窥见端倪,即身居高位的他已经看到并撰文揭示了我国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和乡村工业污染问题,并从全局的角度指出了工业污染的不公正转移扩散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费孝通看到了党和国家已经开始着手解决我国面临的环境问题,特别是由农牧业向工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污染问题、水资源问题。^④

① 费孝通:《对民族地区发展的思考》,载《费孝通全集》(第 15 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年。

② 参见费孝通《又一次访问定西》,载《志在富民——中国乡村考察报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

③ 费孝通:《小城镇研究十年反思》,载《费孝通全集》(第 16 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33 页。

④ 我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陆续开展了“三河”(淮河、海河、辽河)和“三湖”(太湖、滇池、巢湖)水污染防治、“两控区”(酸雨污染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大气污染防治、一市(北京市)和“一海”(渤海)的污染防治工作。

当然，最为重要的应该是，作为一位研究格局和社会关怀格局已经不同于往昔的学者，进入费孝通思考和写作视域的无疑是他感到迫切需要关注的。毫无疑问，作为问题的环境无法排到前列，或者说费孝通毕竟不是一位专门研究环境问题、环境冲突的社会学家。

五 作为“天人合一”的环境

费孝通先生在“不知老之将至”的时候在全国各地“行行重行行”，但岁月不饶人，他已渐至高龄。他感慨道：“从1995年开始，我觉得自己有点老了……1995年以后，做事情有点力不从心了，感觉有个‘老’字来了……开始考虑这个身后之事。”^①正是由于费孝通开始了自己的学术反思，特别是对21世纪出现的新现象的反思，他对“环境”的理解渐至更深的层次，此后“环境”不再是具体的物质环境、地理环境、生态环境了，人文环境和精神环境也被费孝通纳入其分析框架，或者是“把自然带回到社会之中抑或找回社会的自然之维”。^②

费孝通对“环境”认知的改变，与他关于中西文化之别的思考紧密相关。早在1947年，费孝通在《乡土重建》中就开始思考中西文化的差异。面对社会的快速变迁，费孝通认为“人类进步似乎已不应单限于人对自然利用的范围，应当及早扩张到人和人共同相处的道理上去了”。^③不过遗憾的是，不久之后他失去了做田野调查和写作的机会，其思考也一时受限。

一直到1985年，费孝通先生才再次有机会延续30多年前的思考。在包头调研中，费孝通敏锐地发现工业企业中人文生态环境失调的问

① 参见费孝通《小城镇研究十年反思》，载《费孝通全集》（第16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33页。

② 陈占江：《“找回自然”：社会学的本体论转向——基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鄱阳湖学刊》2021年第3期。

③ 参见费孝通《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载《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0页。

题,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企业内近亲繁殖,封闭社区的活力不断消耗;二是边区企业发展缓慢,人才流失严重。^①

很快,费孝通发现边区人文生活环境的失调和自然生态环境的失调其实呈现交织互嵌的状态,生态环境并不是孤立变化的。在定西调研的时候,费孝通发现定西高寒干旱,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恶性循环,地方政府提出种草植树来改善生态环境,但是当地村民对种草植树的积极性却非常低。费孝通指出:“草的转化就不单是自然生态的问题,而是一个人文生态如何与自然生态协调平衡的大课题……说通俗一点,就是人们干什么最为有利?怎么干才最有效?”^② 费孝通据此提出了边区人文生态与自然生态协调平衡的问题。

费孝通意识到环境不仅有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功能,人与其所处的经济地理条件等要素还需要达到最佳配合的一种状态,这状态就是人与环境的一种友好共存模式。可惜的是,此时在边区很多地方环境冲突十分尖锐。1992年,在民族理论研讨会上,费孝通总结自然生态失调和人文生态失调是民族地区同样值得注意的问题,并且这两种失调会直接影响民族地区的持续发展。

在此之后,费孝通关于环境与人的关系的思考更上一层台阶。面对世界上不断出现的新危机,已到耄耋之年的费孝通开始了谦虚地“补课”,重新学习了马林诺夫斯基、史禄国、钱穆、潘光旦等人的著作。这让他再次对中西文化比较这一话题产生了巨大的兴趣,为其思考“人与环境”关系补充了养分。通过对东西文化进行比较,费孝通发现在西方文化中,人文世界被理解为人改造自然的成就,人与自然、文化与自然的对立成为西方文化的一个显著特色,他认为这是“天人对立”的西方宇宙观。在吸取前人的思想后,费孝通提出“天”与“人”关

① 参见费孝通《包头行》,载《志在富民——中国乡村考察报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5~159页。

② 参见费孝通《定西行》,载《志在富民——中国乡村考察报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8页。

系的差别是东西文化差别的根本所在，其实就是东西方对待自然环境的差别。^①

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中，费孝通对人与自然、社会与环境的关系做出了系统的阐释。他认为应该把“人”放到自然历史演化的总的背景下去理解，人、“社会”、“人文”是自然的一部分，是人根据自身的需要造出来“第二环境”，“人文”的活动在很多方面利用自然，利用自然特性，顺着自然内在的规律，适应它的要求，为人所用，而不能真正改变这些规律和原则，也不可能和自然法则对抗，更不可能超越自然的基本规律。^② 费孝通发现，从本质上看，人和自然是合一的，作为人类存在方式的“社会”，也是“自然”的一种表现形式。尽管此时费孝通对“环境”的理解多少受到功能主义思想的影响，不过受传统儒家哲学思想影响的痕迹已经跃然纸上。

此时的环境已然脱离了早期与自然相等的物质环境、地理环境，也与作为发展条件的环境有所区别。环境不仅蕴含了自然环境，还包含了精神环境、人文环境。费孝通晚年提及现代儒家思想代表的钱穆先生所研究的“天人合一”，他听说钱穆先生在仙逝之时对夫人言其对“天人合一”有了新的体会，而且颇有恍然大悟之感，可惜没有文字流传下来。费孝通认为这应该是潘光旦先生提出的“中和位育”，即人与环境都找到合适的位置，两者之间相互适应。^③

六 费孝通环境思想形成的缘由分析

对于这位历经曲折的世纪老人，众多学者将其视为一座“探寻中

① 费孝通：《文化论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识》，载《费孝通全集》（第17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② 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③ 费孝通：《文化论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识》，载《费孝通全集》（第17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

国的现代性”的重要宝藏。陈占江认为目前的费孝通研究大概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由情人思、由时人思和由史人思。^①然而，不管哪一类研究，目前几乎没有学者去探讨梳理费孝通的环境观，甚至有学者疑惑在环境问题上“是什么遮蔽了费孝通的眼睛”。其实，看似不关注“环境”的费孝通一生都在关注“环境”，其对“环境”的理解和思考从未间断过，并且理解层次和深度与社会史和个人生命史紧密相关。本文将三个方面剖析其环境思想形成的缘由。

(一) 中国社会的“三级跳”的影响

毫无疑问，社会变迁深刻影响着人的思想观念，对于作为社会学家的费孝通的影响更是毋庸置疑。作为一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自青年时期开始就十分关注中国社会的变迁，他曾言及我国社会变迁的“三级跳”对自己的影响。他说：“中国社会的这种深刻变化，我很高兴我在这一生里都碰到了，但因为变化之大，我要做的认识这世界的事业也不一定能做好……这是我的一个背景。要理解我作为学者的一生，不能离开这个三级跳。”^②

中国社会的“三级跳”影响了费孝通关于“环境”的四个维度的认识。费孝通在《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一文中将自己一生经历的 20 世纪中国社会发生的两大深刻变化和三个阶段归纳为“三级跳”，第一个变化是从传统性质的乡土社会变成工业化时期，第二个变化是从工业化走向信息化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这三种形态的跳跃。^③作为世纪老人的费孝通刚好是这“三级跳”的见证者，他初入学界的时候就立志要研究社会、改造社会，正因为如此才对“环境”有着不

① 参见陈占江、娄雪雯《中国现代转型与费孝通的思想世界》，《社会学评论》2018 年第 5 期。

② 费孝通：《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载《费孝通全集》（第 17 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65~166 页。

③ 费孝通：《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载《费孝通全集》（第 17 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65~166 页。

同的理解和认识。在观察处于传统社会的村庄社区时，费孝通强调人文地理环境对生活共同体的维系作用；在看到进入工业化社会后我国绝大部分农村发展缓慢时，开始关注环境的资源意义和工业发展过程中的污染问题；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社会来临的时候，则从文化比较的角度思考人与环境的和谐相处关系。

（二）作为最后的绅士的关怀

杨清媚赞誉费孝通先生是“最后的绅士”，因为费孝通身上有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感，他称自己为“从改造社会出发而学科学的社会知识的人”^①。作为最后的绅士，费孝通终其一生反对为研究而研究，希望以其学术研究来造福百姓，希冀自己的研究能影响施政者而让广大老百姓尽快走出“贫”“弱”的处境，即民富。

正是这一社会关怀，使得亲历了普通老百姓生活还是这么苦的费孝通将注意力转移到各地所处的环境中所蕴藏的可资利用的资源。他希望各地的资源可以加速跨区域流通，在市场中交易而变成经济价值。

当然，也正是作为绅士的关怀和责任感，费孝通发现在边区生态环境还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的同时，乡土工业快速发展带来了环境污染问题，在不同的地区环境污染转移现象也愈演愈烈，农村的很多环境优势无法实现转化甚至还要被迫承担环境转移的负面影响。不过，也由于费孝通晚年担任领导职务，他留给后世更多的是关心和呼吁的身影。很显然，从时任青海省副省长的洛桑灵智多杰主动向费孝通先生汇报甘南生态问题这一细节可以窥探到，费孝通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在政界非常有名。当然，费孝通对环境污染问题的直接描述确实在其近千万字的宝贵笔墨中显得不甚起眼。

^① 杨清媚：《最后的绅士——以费孝通为个案的人类学史研究》，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

(三) 费孝通的文化反思

尽管周飞舟认为费孝通的思想转向是他在对中国现实社会不间断的调查实践和反思中形成的,这种思想转向是一种“社会科学”的转向,而不是文化立场的转变。^①但不得不说,作为一生深受中西文化双重影响的学者,从费孝通晚年重读梁漱溟、钱穆等儒家学者的著作可以看出,与其说转向,不如说此时费孝通正在努力从传统儒家思想中汲取营养,以更深刻地思考中国社会的变革。

20 世纪 90 年代末费孝通说“我很幸运,能在有生之年看到一个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世界。但是,年龄已经不允许我再亲身进入这个精彩的世界里去做系统的实地调查了”^②。如果说费孝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从实求知”的话,那么暮年的费孝通开始学习儒家的“格物致知”了。费孝通强调“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的理解,与其说是一种‘观点’,不如说是一种‘态度’,实际上是我们‘人’作为主体,对所有客体的态度,是‘我们’对‘它们’的总体态度”^③。因此,可以说晚年的费孝通先生思考的是人与所处环境的和谐共生关系这一形而上的问题。费孝通亦期望人与环境之间能保持一个协调的局面,维持一种江南水乡的“美美与共”的状态。

七 结语

尽管费孝通不是一名严格意义上的环境社会学家,或者说我们现在不能以环境社会学家的标准来要求故人,但作为社会学家的费孝通

① 周飞舟:《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社会》2017 年第 4 期。

② 费孝通:《进入二十一世纪时的回顾和前瞻》,载《费孝通全集》(第 17 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73 页。

③ 费孝通:《老来还是要再向前看》,载《费孝通全集》(第 17 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468 页。

有着重要的环境社会学思想这一事实无法轻易否认。

在费孝通的学术研究中，环境与人、社会的实然和应然关系，环境对于人和社会的价值等理论议题，一直有着极为重要的分量，特别是将环境作为主体的视角，是推动当下环境社会学深化发展的可能路径，这或许是重新思考费孝通的环境社会学思想的意义所在。另外，长期以来学术界多强调费孝通晚年的学术转向，其实如果从“环境”这一议题出发会发现，费孝通的学术思想有着极强的发展和贯通之处，人与环境的关系是他终其一生思考和回应的问题。费孝通先生虽未看到“天人合一”的至境，但在其环境社会学思想中，“天人合一”何尝不是其一生的追求。

theory and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apitalist economic system and its relate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from both the two dimensions of “inside—outside” of factory production. The third part discussed several theories associated with the theory of the treadmill of production as well as their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to “applying” the theory of the treadmill of production, scholars in domestic academy needs to make innovations and go over and beyond this classical theory by making dialogues with classical theories based on the Chinese experiences and practice.

Keywords: Theory of Treadmill of Production;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Political Economy

To “Heaven-Man Unity”: Fei Xiaotong’s Thesis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and Its Formation

Zheng Jin / 92

Abstract: Up to date, Fei Xiaotong has been integrated as an academic symbol with the labels of “rural China”, “*cha xu ge ju*”,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so on. However, there is a paucity of studies on his thought in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and few scholars have treated him as an environmental sociologist. Based on an examin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themes in Fei Xiaotong’s writing in different periods, this study identified four threads of his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thought. These include taking the environmental as a usefu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functionalism; a condition for development driven by the call for the prosperity in the people; an issue to be addressed during the course of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rural China; and “heaven-man u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In light of his personal life as a sociologist, the last gentleman, and a Confucian, this study also examined possible origins of his environmental thought. Although Fei Xiaotong is not an environmental sociologist in a strict sens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be his environmental thou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that highlights environmental subjectivity.

Keywords: Fei Xiaotong;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Heaven-Man Unity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riple Embeddedness of Institution, Culture and Cognition: the Path for Green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the S Coating Company

Wang Fang Dang Yimeng / 108

Abstract: Taking the embeddedness of “virtual connection” a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based on a field investigation of the green development practice of the S Coatings Company, this paper found that the formulation of green development policie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green behaviors resulted from a joint influence of institutional, cultural and cognitive embeddedness. 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 provides essential environment that guarantees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cultural embeddedness provides identity support; and cognitive embeddedness provides value orientation for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By means of self-restrai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under extern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the establishment of unique green cultures, and the leadership of entrepreneurs with the spirit of environmentalism, private enterprises can strengthen institutional, cultural, and cognitive embeddedness into the practice of their green development. The combined embeddedness of the triple factors provides a key path for private enterprises to achieve “win-win” between economic,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benefits.

Keywords: Embeddedness of “Virtual Connection”; 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 Cultural Embeddedness; Cognitive Embeddedness; Private En-